

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转变^{*}

——消费主导型增长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郭其友, 芦丽静

摘要:通过对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的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发现,消费主导型的增长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方向,并且,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在人均GNI达到3000—4000美元时,形成了以国内消费为主导并且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对平衡的经济增长格局。中国从2002年开始,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出现明显失衡,具有明显的投资和出口导向特征,导致外贸依存度过高、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如何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从投资、出口主导型向国内消费主导型转变,以形成平衡的经济增长动力格局是一个重要课题。文章从国际经济发展经验视角分析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动力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经济增长; 消费主导型; 增长动力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639(2009)02-0190-08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1979年到2005年,GDP的平均增长率:1979—1989年为9.53%,1990—1999年为9.71%,2000—2005年为8.78%^①。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举世瞩目,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做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一般而言,消费、投资、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但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三者所起的作用也有所不同。罗斯托(Rostow,1960)认为,经济只有经历了起飞阶段和成熟阶段才能到达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在起飞和成熟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而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钱纳里(Chenery,1988)则根据各国需求结构的不同,将经济分为内向型、中间型和外向型三种。内向型的经济主要依赖国内需求拉动特别是消费需求的

拉动,适合于国内需求巨大、经济发展相对成熟的国家;而外向型经济通常以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为特征,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或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通常采用这种拉动模式。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双中期”阶段(李晓西等,2006),在没有进入高额群众消费发展阶段是不可能完全以国内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国外学者则根据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得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依靠高资本形成率、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和日益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Mathew Shane & Fred Gale, 2004)。国内一些学者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支持我国外向型经济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意义。譬如运用C-D生产函数,计算出从1978—2005年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出口的产出弹性系数(每1%的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2163(廖涵、张鸿武,2007)。有观点认为,2002年以来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及国际游资的进入,引发了国内旺盛的投资需求,带动了经济快速

* 收稿日期: 2008-12-09

作者简介: 郭其友(1963-),男,福建泉州人,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361005);

芦丽静(1979-),女,河北石家庄人,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研究生(厦门361005)。

①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增长(刘焜松、周斌, 2005)。

实际上,从2002年开始,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出现失衡,消费率及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持续下降(张雪松, 2003 尹世杰, 2004),因此,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7)指出,我国经济增长应实现由投资、出口拉动到消费拉动的转变。有学者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和经验数据分析了我国的投资、消费比例,认为将投资率控制在30% - 35%、消费率控制在60% - 65%之间可以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贺铿, 2006)。这些研究文献局限于从某一具体角度分析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动力,较少将我国的经济增长情况与其他国家进行阶段性比较,缺乏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趋势研究。基于此,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国际比较分析,借鉴代表性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研究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影响作用的大小不同,这可以用各支出占GDP的比重及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某支出的增量/支出法下GDP)来衡量。各支出占GDP的比重可以表明其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程度;贡献率则代表了各因素对经济增长速度影响力的大小。一般说来,占GDP比重较高的支出要素贡献率较高,但也不尽然,特别是在经济波动剧烈的年份中两者存在显著的差异。将两个指标结合使用可以更全面地把握各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作用的变化趋势。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大支出占GDP的比重和贡献率如图1和图2所示,根据两个统计指标的变化趋势,可以大致将近30年来的经济增长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 - 1992年。在这一阶段,我国的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重)比较高。1979 - 1992年,消费率平均为64.7%,最高达到67.1%(1981年),而这一时期投资和出口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5.9%和10.2%。从贡献率角度,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率也居于三大支出的首位,三者对GDP的贡献率分别是65.6%、

32.2%、16.1%。从图1和图2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消费对GDP的主导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一时期改革开放的时间较短,出口处在起步时期,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小,国家对改革开放以前的“重积累,轻消费”的政策做了调整,固定资产投资受到一定的压制;另一方面,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商品短缺的情况逐渐克服,居民长期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得到释放,形成对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热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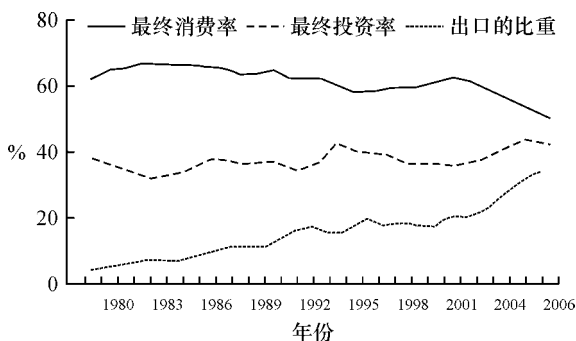


图1 三大支出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 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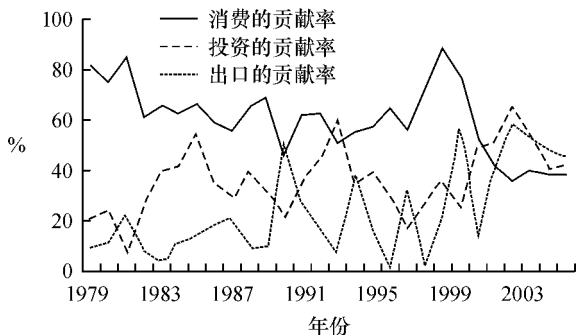


图2 三大支出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 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这一时期消费对GDP的主导作用十分显著,但随着投资和出口水平的迅速增长,三者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呈现收敛的趋势。投资占GDP的比重在1981降至31.9%,以后逐年回升,大致维持在36%的水平;而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79年的4.65%上升至1992年的16.96%。从贡献率来看,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波动幅度较大,如投资的贡献率最高达到54.98%(1985年),最低为7.33%(1981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达到50.57%(1980年),最低为3.91%(1983年),但从总体上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趋势。

第二阶段: 1993年以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三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 1993年开始, 在经济全面过热的情况下, 投资率迅速上升, 并连续 3 年保持在 40% 以上, 而消费率则降到了 60% 以下; 在 1996 年实现“软着陆”以后, 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政府实施了启动内需的政策, 虽然稳定了投资率, 但并没有改变消费率逐年下滑的趋势; 从 2002 年开始, 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高经济增长,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累积效应的释放, 长期高比重投资的产能效应开始显现, 投资率自 2003 年开始连续 5 年保持在 40% 以上, 并在 2003 年达到历史最高点 43. 6%, 出口占 GDP 的比重也一直上升至 35. 1%, 与投资和出口的迅猛增长形成鲜明的反差, 消费率自 2000 年后迅速下降, 在 2006 年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49. 9%。三者收敛的趋势进一步增强。

从贡献率来看, 虽然消费的贡献率在 1998—2000 年有显著的上升, 但这主要是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投资和出口的低迷, 并没有改变消费贡献率在波动中下降的趋势。从 2002 年开始, 投资和出口的贡献率相继超过了消费的贡献率, 并持续至今。由于三者对 GDP 的拉动次序从消费—投资—出口, 变为投资—出口—消费, 可以说, 我国的经济明显呈现出投资导向和出口导向的特征。

二、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转变的国际经验

我国是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 虽然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具体国情有很大不同, 但各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与我国目前类似的经济增长阶段, 其经济增长的经验对我国经济平稳增长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此, 本文选择了经济增长相对平稳和成功的发达国家, 对各国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比照中国的发展阶段进行实证分析, 总结其经济增长的主导动力, 寻找共同的发展规律。

(一) 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我们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支出法 GDP 作为被解释变量, 消费、投资和出口作为解释变量, 各变量数据均进行了对数处理^①。考虑到不同阶段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

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能有所不同, 本文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情况做了分阶段的实证分析。

(二) 平稳性检验

对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消费、最终投资和出口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 (ADF) 检验, 观察各序列是否平稳, 结果见表 1。

表 1 ADF 检验结果

国别	序列	检验类型	ADF 值	5% 临界值	DW 值
美国	LNGDP	(Q Q 3)	2.678233	-1.9486	1.970204
	LNFC	(Q Q 2)	3.225272	-1.9483	2.05798
	LN I	(Q Q 2)	4.065432	-1.9483	1.972474
	LNEX	(Q Q 1)	5.25498	-1.9481	1.888783
	D(LNGDP)	(c t 2)	-4.642725	-3.5136	1.972563
	D(LNFC)	(c t 1)	-4.241799	-3.5136	1.995228
	D(LN I)	(c t 1)	-5.581579	-3.5136	1.974764
日本	D(LNEX)	(c t 1)	-4.857039	-3.5136	1.960573
	LNGDP	(c Q 1)	-3.61538	-2.9303	1.936524
	LNFC	(c Q 1)	-5.327145	-2.9303	1.980385
	LN I	(c Q 1)	-3.021532	-2.9303	1.957569
	LNEX	(c Q 1)	-4.109089	-2.9303	2.002133
	LNGDP	(Q Q 1)	-1.39578	-2.5932	1.850393
	LNFC	(c Q 1)	-1.066614	-2.9118	2.233964
澳大利亚	LN I	(c Q 1)	-1.345778	-2.9118	1.63
	LNEX	(Q Q 1)	3.817971	-1.9462	1.942261
	D(LNGDP)	(c t 1)	-4.177801	-3.1875	1.863613
	D(LNFC)	(c Q 1)	-2.674889	-2.5932 (10%)	1.975451
	D(LN I)	(Q Q 1)	-3.157391	-1.9462	1.782422
	D(LNEX)	(c t 1)	-4.1219	-3.4875	1.994339

注: c 表示带有常数项, t 表示带有趋势项, s 表示采用的滞后阶数, 1 代表滞后一阶, 依次类推。根据 AIC 准则确定。LNGDP、LNFC、LN I、LNEX 分别表示 GDP、最终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对数。

表 1 给出了 3 个国家 4 个序列的检验结果, 日本的各序列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序列,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各序列均不能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单位根假设, 但经过一阶差分后, ADF 值都小于临界值, 拒绝单位根假设。可以得出结论, 日本的各序列为 I(0) 序列, 其他国家的序列为 I(1) 序列。

(三) 长期均衡关系的协整检验及长期方程

根据协整理论, 同阶单整序列可能存在协整关系。通过单位根检验, 各国的各个变量之间是同阶的, 所以可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为了考察各国的消费、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变

① 美国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分析局; 日本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澳大利亚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图 3 和表 2 数据来源同上。

化,通过多次实验将各国经济分为两个阶段,运用 Johansen 方法进行协整检验^①。通过检验可以得出,各国 GDP 与消费、投资、出口之间在各阶段都存在至少一个协整向量。一般而言,第一个协整向量是最有解释力的,将其标准化后得如下长期方程:

$$\text{LNGDP} = 1.16 + 0.59\text{INFC} + 0.20\text{INI} + 0.16\text{LNEX} \quad \text{美国 (1945-1970)}$$

$$\text{LNGDP} = 0.81 + 0.78\text{INFC} + 0.12\text{INI} + 0.07\text{LNEX} \quad \text{美国 (1970-2000)}$$

$$\text{LNGDP} = 0.011 + 0.47\text{INFC} + 0.31\text{INI} + 0.06\text{LNEX} \quad \text{日本 (1960-1976)}$$

$$\text{LNGDP} = 0.88 + 0.66\text{INFC} + 0.19\text{INI} + 0.15\text{LNEX} \quad \text{日本 (1976-2000)}$$

$$\text{LNGDP} = 2.5004 + 0.32\text{INFC} + 0.26\text{INI} + 0.31\text{LNEX} \quad \text{澳大利亚 (1960-1976)}$$

$$\text{LNGDP} = 0.92 + 0.64\text{INFC} + 0.06\text{INI} + 0.16\text{LNEX} \quad \text{澳大利亚 (1976-2001)}$$

因为已经对各序列数据做了对数处理,模型中的系数表示 GDP 对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弹性,即各变量的百分比变化导致 GDP 的百分比变化。从协整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系数的经济意义合理,统计量显著,说明变量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二战后,各国都实行了鼓励投资和出口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加快发展速度,经济增长进入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以美国 1970 年代开始的“滞胀”和两次世界性石油危机的出现为结束标志,所以模型对各国阶段的划分比较符合各国的经济周期,具有一定合理性。

(四) 结论

从以上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消费主导型的增长模式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方向。从各国的长期方程可以看出,在各国发展的第一阶段,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第二阶段更为显著: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日本的投资弹性从 0.31 降至 0.19^②,澳大利亚的投资和出口弹性分别从 0.31、0.26 降至 0.05 和 0.16,美国的投资、出口弹性也从 0.2 和 0.16 降至 0.12 和 0.07;与此同时,消费对 GDP 的拉动作用都有着明显的增强,两阶段相比,日本增加了 0.18 个百分点,澳大利亚增加了 0.32 个百分点,虽然美国在第一阶段的消费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第二阶段又增加了 0.19 个百分点。可以说,上述各国都已经形成了以消费为主导,投资、出口稳步增长的发展格局。

第二,消费对 GDP 拉动的主导地位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3000-4000 美元之间得到确立或加强。将上述协整结果结合各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可以发现以下规律:各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对应的人均 GNI 大致在 1000-3000 美元之间,在这一区间内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甚至与消费的拉动作用持平(澳大利亚);在人均 GNI 达到 3000 美元后,投资、出口对 GDP 的影响呈下降趋势,消费毫无争议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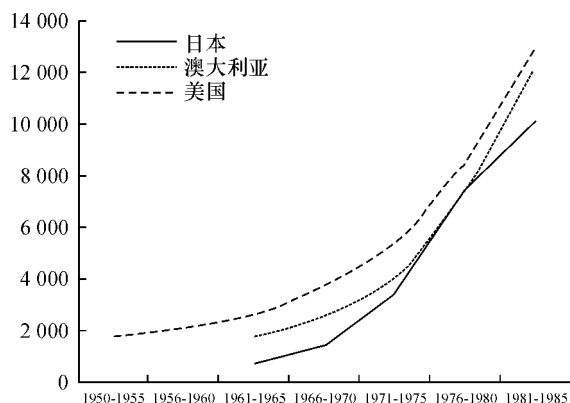


图 3 各国的人均 GNI(单位:美元)

第三,收入水平的提高与收入差距的缩小是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必要条件。根据长期方程,尽管各国在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显著,但三大支出拉动的次序依然是消费—投资—出口,并且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3000-4000 美元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快速提高。什么因素导致了上述情况的出现呢?

通过研究发现,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2000 美元后,各国都采取了大力提高工资水平、缩小收入差距的收入政策。日本在 1960 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高积累、高投资的同时快速提高工资水平,其基本工资自 1961 年开始,每年约递增 10% 左右,到 60 年代后期,增加额超过 15%。工资的提高带动了国内消费的提高,60 年代后期出现的耐用品消费热潮,使日本成为大众消费社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六七十年代实施

① 日本的数据自 1960 至 2000 年,澳大利亚的数据自 1960 年到 2001 年,美国的数据自 1950 年至 2007 年;澳大利亚数据中 1960-1970 年的存货增加数据缺失,未统计入最终投资。

② 日本在这一时期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甚明显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出口占 GDP 的比重比较小,一直稳定在 11% 左右;另一方面是由于协整检验对样本的限制 (≥ 16),第一阶段的样本区间为 1960-1976 年,70 年代开始的石油危机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出口,削弱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了相对完善的收入均等化政策,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功能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惠及各个职业阶层,这对消费水平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李国庆等;孔凡静,1995)。美国战后颁布了《国家劳资关系法》并根据通货膨胀率和经济的增长速度及时修正《公平劳工标准法》,工资差距逐步缩小。在社会保障方面,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迅速,60年代先后通过住房补助、食物券等一系列法案,从1950年到1970年,个人消费从1267美元上升到3671美元,和GDP的增长速度基本持平(胡莹,2006)。澳大利亚的劳动仲裁委员会在70年代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对工资增长采取干预措施,一是实行最低工资制,二是实行工资增长同日常消费品价格指数挂钩的办法,这两项措施确定了企业增资的基本机制,从而确保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职工的最低工资收入,对缩小收入差距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60、70年代澳大利亚的男性工资水平的增幅分别达到了7%和12.5%。收入的提高带动了消费水平的提高,70年后澳大利亚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对稳定在60%左右,这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也是比较高的(马永堂,2003)。

三、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不平衡的原因

据以上分析,人均国民收入在2000—3000美元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是奠定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基础的阶段。数据分析表明,到2006年,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2000美元,预计2009年将达到3000美元。从国际经验与理论分析看,在这一阶段应该开始由投资、出口到以消费为主导的国内需求的转变,但我国目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呈快速下降趋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将我国的情况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进行阶段性比较可以发现,我国这种特殊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大的就业压力下,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使消费增长乏力

在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一直面临着比较大的就业压力,2006年,城镇整体失业率为4.1%,如果把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计入统计口径,失业总人数可能达到或超过1亿(MF,

2007),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剩余削弱了劳动者对工资的讨价还价能力,“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非常突出。由于工资水平无法与经济增长保持相同的增长幅度,工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由表2可以看出,从2001年到2005年,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从52.73%持续降到了41.4%,降低了近12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在经济发展的类似阶段,澳大利亚的劳动报酬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在稳定中有所上升,由1971年的52.5%上升至1976年的62.4%;美国也基本稳定在52%左右。

表2 中、美、澳三国劳动报酬
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比较(%)

年份	中国	年份	美国	澳大利亚
2001	52.73	1962	51.2	52.5
2002	52.55	1964	54.0	50.9
2003	51.23	1968	52.1	54.3
2004	47.22	1970	53.48	53.5
2005	41.41	1972	51.9	56.5
2006	——	1976	50.0	62.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如果劳动报酬收入占居民个人收入的比重较小,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对消费的影响会相对减弱。例如,美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有限,政府可以通过投资收益和转移支付的手段,增大利润分配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来抵消劳动收入下降对消费产生的影响。但从我国的收入来源来看,我国工资性收入占居民个人收入的比重是比较高的,近几年一直维持在70%左右,财产性收入比重仅为2%左右,转移性收入比重为22%左右(据中经网数据测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居民收入主体的劳动报酬比重的下降,对消费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不断弱化的主要原因。

(二)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近年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有所加快,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根据表3的相关数据,城镇高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率平均在11%左右,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率仅为7.7%,以中低收入群体较集中的制造业为例,从2000年2006年,制造业的工资水平从8750元上

升至 17966 元,而同期全国的平均工资水平从 9371元上升到了 21001元,无论从绝对数还是从增长率来看,制造业的工资水平都不及全国的平均工资水平。

表 3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及增长率

年份	中低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	
	年可支配收入	增长率	年可支配收入	增长率
1998	4176	0.04	8415	0.06
1999	4456	0.07	9206	0.09
2000	4718	0.06	10077	0.09
2001	5056	0.07	11218	0.11
2002	5079	0.005	13212	0.18
2003	5542	0.09	15141	0.15
2004	6206	0.12	17132	0.13
2005	6928	0.12	19526	0.14
2006	7788	0.12	21695	0.11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数据计算。

中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差异导致了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国中属于比较高的。根据表 4 近年我国的基尼系数都处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以上,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2007年基尼系数已经接近 0.5。收入差距过大也是消费率不断下滑的重要原因,由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趋近饱和,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中低收入群体虽存在大量潜在的消费需求,但由于收入增长缓慢,潜在的消费需求无法转换为有效的消费需求,消费率持续走低。与我国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的情况相反,美国和日本在人均国民收入为 2000- 3000美元时,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 0.35左右,收入差距相对稳定。以美国为例,从 1960年到 1976年,美国

表 4 中、美、日三国的基尼系数比较

年份	中国	年份	美国	日本
2000	0.4089	1962	0.362	0.376
2001	0.4031	1964	0.361	0.353
2002	0.4326	1966	0.349	—
2003	0.4386	1968	0.348	0.349
2004	0.4387	1970	0.353	0.355
2005	0.447	1972	0.359	0.357
2006	0.470	1974	0.355	0.344
2007	0.480	1976	0.358	—

资料来源:www. census. gov 及中国统计局网站。

20% 的最低收入家庭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与 20% 的最高收入家庭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的变化均在 1 个百分点以内,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份额也非常稳定,这就有效保证了消费水平与 GDP 水平的同步增长,保持着 80% 左右的高消费率(Enrique Palazuelos Manso 2006 澳大利亚统计局)。

(三)公共产品的缺乏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增强了消费的不确定性

我国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在公共产品的提供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距。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得到拓展和深化,受益比例不断提高,为居民提供了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等全方位的保障。日本在 1961 年就实现了“国民皆年金”的目标,确立了国民的养老保险制度。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最显著的效果是保障了低收入者和残疾者的收入水平,从而保证了消费水平的稳定。澳大利亚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以社会救助为核心,辅之以养老保障和全民医疗保障的救助系统,具有全民化、多样化的特点,同时,澳大利亚居民交给政府的收入税比较高,作为回报,居民可以大量消费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

在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我国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体系及住房等带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性质的行业都进行了市场化、产业化的改革,教育、医疗和住房的价格不断上涨。在居民的实际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和住房的支出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大幅挤占了居民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更为严重的是,居民对这三项支出产生了强烈的支出预期,增强了消费的不确定性,从整体上降低了未来的消费需求。另外,我国公共产品的缺乏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并存。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及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比较窄,仅限于城镇相对正规的就业部门,对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劳动力及流动劳动力的覆盖率很低。以 2006 年为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及失业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 49.6%, 41% 和 40%^①,并且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人群大部分为中高收入群体,最需要保障的低收入群体并没有从社会保障中得到期望的收益,因此,即使其收入有所增加,也不会扩大消费,而是为养老、医疗及失业等风险进行相应

①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6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整理。

的储蓄。

消费的拉动作用过低、经济增长片面倚重投资和出口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投资方面,投资率越高,越容易引发经济的大起大落,随着投资率的提高,投资效率却在不断下降,重复投资的情况时有发生;出口方面,2006年出口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35%,外贸依存度为65%^①,既带来了频繁的贸易摩擦,又严重侵蚀了我国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减弱,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已经出现了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通过出口退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得以生存,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消费方面,国内市场需求不旺迫使企业将目标转往国际市场,并不断压缩劳动力成本以提高竞争力,导致国内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形成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

四、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转变的实现路径

借鉴美、日、澳大利亚的发展经验,并结合我国目前面临的实际经济问题,可以得出结论,建立以消费为主导的平衡需求结构,以消费来引导投资,有利于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出口结构的顺利升级,培养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形成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机制。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消费水平的提高是非常可行的。我国有13亿人口,城镇和农村市场都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市场,居民的消费处于发展性消费的阶段,需要开展新一轮的结构升级,轿车、通讯产品及高质量的服务消费是这一轮结构升级的新热点;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消费比较滞后,根据统计数据,2007年我国的社会消费品总额中,占人口55.1%的农村居民仅消费了总消费品的32.28%,在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上也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这既反映了农村居民在由温饱到小康过渡阶段收入过低的事实,又说明了农村消费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要实现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仅仅采用刺激消费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根据影响消费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及产业政策和政府支出等多方面的改革。

(一) 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扩大劳动报酬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

在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劳动报酬收入的情况下,工资的稳定增长是保证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必要条件,但如何实现工资的稳定增长是我国目前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仅仅参考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是不够的。日本和韩国都经历了与我国类似的工业化阶段,但两国在其工业化时期的工资提高除了有制度上的保证外,更多的是由市场推动的。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带来了日本制造业工资的长期上升,由于劳动力从供过于求转为供不应求,再加上由于生产力的增加,中小企业的支付能力普遍增强。韩国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实现了劳动力从供过于求到供不应求的转折,并且由于韩国的通货膨胀现象一直比较严重,工会多以罢工等方式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刘旭明,1995)。

目前,我国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呈增长趋势,短时间内无法实现劳动力从供过于求到供不应求的转变,依靠市场供求作用大幅度提高劳动收入不符合现实。提高劳动报酬所占的比重更多的需要给正常的工资稳定增长机制提供制度保证。应该在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的基础上,将物价指数作为工资上涨的重要参考指标,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等预防和解决拖欠工资的长效机制。我国的新劳动法已经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企业为躲避新劳动法大量裁员与重签劳动合同的现象,表明新劳动法在实施细则方面有待进一步明确,实施力度应进一步强化。

保证就业率一定程度的增长也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我国的制造业正在从劳动密集型到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转型,劳动力的容纳能力不会再有大幅度的提高,但我国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发展规模小、层次低,具有比较大的发展潜力,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容纳过剩的劳动力是可取的。只要保证就业率的增长带来的劳动报酬增加速度能抑制劳动报酬所占比重的下降,就可以在整体上保证消费率不至于快速下降。

(二) 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

^① 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7》。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可以使居民产生稳定的支出预期,从而减少消费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可以保障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更大程度地分享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从而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稳步提高。应当加快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建立覆盖所有劳动者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及失业问题的社会保障系统,主要体现为:完善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制度和农村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解决城镇非从业人员的医疗保障和农民的大病保障问题;在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同时扩大城镇保险制度的范围,将最需要保障的农民工及其他非正式部门的就业人员纳入养老保险体系,最终实现统一的、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失业保险与最低生活保障及促进就业的联动机制,发挥失业保险在稳定就业和减少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 调整产业结构和政府的支出结构,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长期重视投资和出口导致我国三大产业发展的比例不平衡,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中制造业比重较大,而与消费需求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对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高档房地产投资的形成资金、市场准入等进行硬性约束,控制其增长速度及规模,将投资更多地转向适合中低收入群体的房地产、教育、医疗等产品的供给上来,促进普通民众消费潜力的释放。同时,改革以出口创汇为目的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促使出口导向型企业进行新的成本核算,引导企业发展与消费需求密切相关的信息服务、交通通讯及旅游等第三产业,根据消费需求的地区化和层次化差异,积极开拓有利于提高整体生活质量的消费品种和渠道,使各种服务性产品在产品品种、产品技术含量方面与不同层次、不同地区居民消费需求的特点相适应。

同时,政府需要进行财政支出体制方面的改革,以便为消费需求的提高提供基础设施方面的保障。根据目前投资过热的实际情况,应当考虑减少政府的投资性支出,将更多的财力用于民生和消费,特别是增加农村教育支出、医疗卫生等支出,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建立城乡一致的公共财政体制。

[参 考 文 献]

- 澳大利亚统计局. <http://www.abs.gov.au/>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统计研究》,2007年3期:3-12页。
 贺铿:《中国投资、消费比例与经济发展政策》,《数量经济技术研究》,2006年5期:3-10页。
 胡莹:《战后美国收入分配政策及启示》,《国际经济问题研究》,2006年第3期:203-205页。
 孔凡静:《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战略》,厦门:鹭江出版社,1995年:26-32页。
 李国庆、丁红卫:《日本人均GDP在1000至3000美元时期的均等化发展及政策因素》, www.sociology.cass.cn
 李晓西等:《新世纪中国经济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86-87页。
 廖涵、张鸿武:《中国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6期:67-71页。
 刘焯松、周斌:《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主动因研究》,《管理世界》,2005年第11期:152-153页。
 刘旭明:《朝国经济发展之路》,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16-18页。
 马永堂:《澳大利亚的工资分配制度》,《环球劳动》,2003年2期:57-58页。
 美国商务分析局. <http://www.bea.gov/>
 钱纳里,塞尔昆:《发展的型式1950-1970》,李新华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79-120页。
 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http://www.worldbank.org/>
 尹世杰:《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消费经济》,2004年第5期:3-6页。
 张雪松:《三大需求对我国GDP的贡献》,《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3-8页。
 中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Enrique Palazuelos Manso: The Influence of Earnings on Income Distrib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5 2006
 MF. Explaining China's Low Consumption: The Neglected Role of House Income 2007-07.
 Kenneth J. Branco and John B. Williams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Jul 1988
 Mathew Shane and Fred Gale: China: A Study of Dynamic Growth, Outlook Report No. (WRS0408) 2Q October 2004, <http://www.ers.usda.gov>
 Rostow, Walt Whitman: the Stage of Economy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责任编辑:许玉兰;责任校对:许玉兰,杨海文】